

四川大学博物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 编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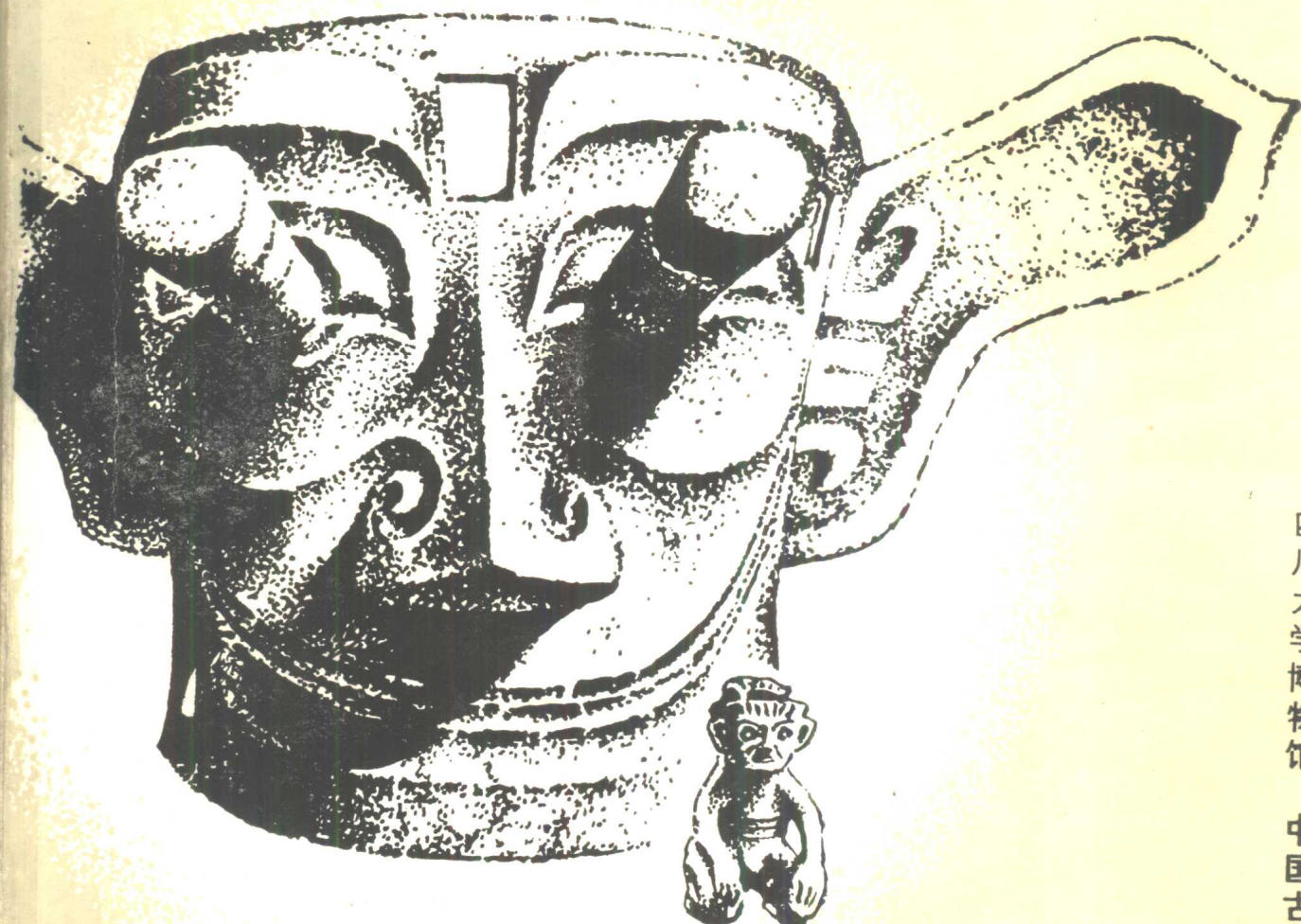
1989

南方民族考古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UME 2

中国 四川 成都



主 编

童恩正 四川大学博物馆 教授

编辑

石应平 四川大学博物馆 讲师

李 连 四川大学博物馆 讲师

学 术 顾 问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石兴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教授

严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系 教授

佟柱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教授

邹衡 北京大学考古系 教授

郑德坤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教授

张忠培 故宫博物院 教授

俞伟超 中国历史博物馆 教授

黄展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教授

Prof. K.C.Chang	<i>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i>
Prof. I.C.Glover	<i>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ndon University</i>
Prof. Karl L.Hutterer	<i>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i>
Prof. Magdalene v.Dewall	<i>South Asia Institute, Heidelberg University</i>
Dr. Heather Peters	<i>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i>
Dr. Jessica Rawson	<i>Department of Oriental Antiquities, The British Museum</i>
Prof. Yoshiro Shiratori	<i>Department of History, Sophia University</i>
Prof. Klaus Kilian	<i>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onn, W. Germany</i>

26.32
176
1:2

目 录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	童恩正、卡尔·L·赫特勒 (1)
铜鼓三题——蛙鼓、土鼓与军鼓·····	饶宗颐 (27)
滇文化、铜鼓在东南亚岛屿及其在东南亚史前史中的意义·····	卡尔·L·赫特勒 (33)
从青铜乐钟的类型谈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	殷玮璋 (41)
失蜡法铸造的先黑格尔 I 型铜鼓的发现·····	今村启尔 (51)
黑格尔 I 型铜鼓与“动物纹样”艺术·····	丘兹惠 (59)
商人礼仪艺术中的萨满教特征及对四川广汉三星堆新近发现的推测 ·····	伊利莎白·C·约翰逊 (65)
华南战国时期两个墓地的分析：试论华南公元前一千纪时复杂社会的进化 ·····	西村正雄 (69)
广西、云南、贵州古代铜鼓锈蚀的研究·····	孙叔云、韩汝珩 (109)
北流型铜鼓调音问题初步研究·····	李世红、万辅彬 (121)
唐宋时期“东蛮”族属的探讨·····	蒙默 (129)
东亚早期冶金术：南方传统·····	乔埃斯·C·怀特 (153)
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	杨建芳 (161)
巴与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	佟柱臣 (177)
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	黄展岳 (193)
广东出土青铜器特征探讨·····	徐恒彬 (203)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 ·····	陈显丹 (213)
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	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 (233)
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	罗二虎、陈放、刘智慧 (299)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ume. I, 1989

CONTENTS

- On the Mesolithic Age of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 *Tong Enzheng, Karl L. Hutterer* (1)
- Three Problems about Bronze Drums *Rao Zongyi* (27)
- Dian Bronze Drum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Karl L. Hutterer* (33)
- Some Problems on Bronze Culture in South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Typology of the Bronze Bells *Yin Weizhang* (41)
- The Discovery of a Pre-Heger I Type Bronze Drum Casted by
the Lost-Wax Method *Keiji Imamura* (51)
- The Heger I Drum and "Animal Style" Art *Tze huey Chiou-peng* (59)
- "Sha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 Ritual Art and some
Speculations about Recent Finds from Sanxingdui, Guanghan,
Sichuan *Elizabeth Childs-Johnson* (65)
- An Analysis of two Cemeteri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South China: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n South
China *Masao Nishimura* (69)
- A Study of Cosion Products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from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u *Sun Shuyun, Han Rubin* (109)
- The Initial Research on Tuning Sound Problem for Beiliu Bronze
Drums *Li Shihong, Wan Fubin* (121)
- A Study of Nationality of "Dong Ma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Mong Mo* (129)
- Early East Asian Metallurgy: the Southern Tradition
..... *Loyce C. White* (153)
- Yue-Style Jade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Yang Jianfang* (161)
- On Artifacts of Ba and Shu Culture *Tong Zuchen* (177)
- The Problem on the Han Tomb Occupants at Luopowan in

Gui County, Guangxi	<i>Hang Zhanyue</i> (19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s Unearthed in Guangdong	<i>Xu Hengbin</i> (203)
The Culture and Chronology at Sanxingdui Site, Guanghan, Sichuan	<i>Chen Xiandan</i> (213)
<u>Report</u>	
Excavations at Zhihui Street Site (Tang-Song Dynasty), Chengdu City	<i>Chengdu City Museum, Sichuan University Museum</i> (233)
Palynology Analysis of the plant remains from Zhihui Street Site in Chengdu City	<i>Luo Erhu, Chen Fang, Liu Zhihui</i> (299)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

童恩正

(中国四川大学)

卡尔·L·赫特勒

(美国密执安大学)

一. 前言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很多考古学家都已经指出了南中国与东南亚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但直至最近三十年来，系统的考古发掘方在这两个区域展开。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学者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始终存在着局限性，因为西方学者能够直接阅读中文的并不多，而中国学者在获取西方资料方面也存在困难。为此，对于这两个区域之间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存在的共同点和相异点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本文是中美双方的学者企图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弥补这一缺陷的初步尝试，在此之后，我们还将在此领域内作一些其它的探索。由于在这辽阔的地区之内，对于有关史前文化发展相似性的程度和性质至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将南中国和东南亚的资料加以比较。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希望能重建这一地区内为近代政治疆域所割裂的古代文化发展的完整的图画。

本文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更新世的晚期和全新世的初期。其主要的目的并非泛泛地讨论有关的理论问题，如狩猎采集人群的社会组织或文化变迁等，而是全面地对田野发掘所获的实际资料作一次考察。考察的目的有二：（1）概括性地介绍现有的资料以及它们显示出的文化系列；（2）澄清一些妨碍比较研究的文化分类和名词使用中的混乱。

在更新世的晚期和全新世初期，我们特别注意一种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在东南亚，人们习惯称之为“和平文化”（Hoabinhian），而在南中国，类似的或相近的文化现象则笼统地被归纳为“中石器时代”。华南中石器时代的概念，最初是由裴文中在1935年提出的，当时他使用了这一名词来描述广西洞穴遗址中的某些石器工艺（Pei: 1935）。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从晚更新世延续到早更新世的文化系列的发现，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周国兴、易光远：1983）。

在东南亚，“和平文化”的名词最初是由玛德雷琳·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所创造的，从二十年代开始，她即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Hoabinh）的洞穴遗址中发掘出不少

利用砾石打击而成的石核石器 (Colani, 1926)。1932年, 在河内召开的第一届远东史前学会议正式通过科拉尼的命名, 并且确定和平文化是一种中石器时代文化, 因为它缺乏陶器和通体磨光的石器 (Colani, 1933; Saurin, 1971; Solheim, 1974)。尽管各家对于“和平文化”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 有人认为是一种传统, 有人认为是一种技术复合体 (Matthews, 1966; Dunn, 1970; Gorman, 1971), 但是这一名词仍然在东南亚考古学中约定俗成地被采用了。

有关东南亚中石器时代或时期的内涵, 学术界的意见十分分歧。所谓中石器时代的概念, 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一般学者均将之视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技术上的一种转变 (Bandi, 1966)。在欧洲, 中石器时代技术是以石器成分中出现大量的细石叶工具为其特征的, 这些细石叶一般都呈几何形状。不过最近二十年以来, 很多学者在讨论中石器时代时, 都不再强调技术变迁的本身, 而是强调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人类对于急骤改变的自然环境的适应 (Bandi, 1966; Milisauskas, 1978)。早期研究东南亚的考古学家一般都接受欧洲有关史前时代的分期法, 以及其分类标准 (Beyer, 1948; Dani, 1960; Heekeren, 1972)。最近以来, 对于东南亚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这一变迁所采取的社会和技术的适应是否与欧洲一致等问题, 已经提出了疑问; 相应地, 欧洲的断代是否适用于东南亚, 也就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Aigner, 1976; Hutterer, 1976; Solheim, 1969)。本文作者的意见是: 如果从旧石器时代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中一个转变的阶段来看, 那么在南中国和东南亚, 确实存在着一个特征明显的中石器时代。

以下我们将要介绍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南中国和东南亚文化变迁的有关资料。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一时期的石器工艺, 其它人工制品或自然遗物是否与旧石器时代或以后的农业社会 (新石器时代) 所遗留的相同? 这些遗物的特征和发展序列如何? 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发展的相似程度究竟如何? 这些相似性又受到了哪些地理因素的局限? 最后, 我们还要讨论产生这一转变时期的器物群的特征的原因, 以及这些器物群具有不同的地理分布的原因。

二. 研究历史的回顾

回顾一下本地区对这一问题考古学研究的历史, 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本文将要征引的资料。所以我们在此介绍一下南中国和东南亚考古学研究的简况。

在南中国, 有关史前遗物的介绍最初可能是由科尔伯恩·巴伯 (Colborne Barber) 开始的。1882年, 当他在四川省旅行时, 曾经在重庆找到了两件石斧并且写了报告 (Barber, 1882)。从1913年开始, 休斯顿·埃德加 (J. Hutson Edgar) 在长江、岷江两岸以及川西高原上发现了一系列的遗址 (Edgar, 1917; 1926—29; 1933—34)。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 美国中亚考古队的沃尔特·格兰杰 (Walter Granger) 在四川东部地区进行了旧石器时代的调查。在万县盐井沟, 他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在采集品中有一穿孔石盘状器, 其上有很厚的钙质沉积。另有一件鹿角, 有些桠枝曾经被粗糙的工具砍

掉。为此格兰杰假设曾经有人类与盐井沟动物群同时存在，其时代约在上新世至更新世(Granger, 1932)。

1926—1927年，格兰杰和纳尔逊(N·C·Nelson)在云南进行了一次调查，在龙家找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石器与川东的发现相似(Nelson, 1927)。不久以后，有的学者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进行了一些考察，如阿诺德·海姆(Arnold Heim)和埃德加于1930年在此调查，找到了两件石刮削器，他们认为这是属于莫斯特林技术(Mousterian Technique)(Heim, 1933:175—176)。1931年，戈登·鲍尔斯(Gordon T. Bowles)也在此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Bowles, 1933)。1985年，根据鲍尔斯手绘的地图，童恩正又在此进行了复查，沿炉霍县境内之达曲河—尼曲河—鲜水河流域发现了一些砾石打击的石器，但均为地表采集，没有发现文化层¹⁾。

1935年，裴文中曾在广西进行洞穴调查，在武鸣县发现了芭桥、芭勋、腾翔等三处遗址，在桂林发现了D洞遗址。采集的遗物有砾石工具、穿孔砾石、磨石、石刀等，裴文中均将之纳入中石器时代工艺的范畴(Pei, 1935)。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南方有中石器时代存在。

由于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从1939年到1949年，华南的石器时代考古完全停顿了。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仅仅是局限在很少数的几个遗址中，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发掘，所有被认为是属于这一时期的遗物都是从地表采集的。大部分考察者均为外国人，很多属于自然科学家(如地质学家或生物学家)而非经过训练的考古学家。

从1950年开始，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华南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新的资料均是由科学发掘而来，具有明确的地层序列，而且器物群往往与动物化石相联系。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使我们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并且从新的理论框架的角度加以探讨。

在东南亚，考古学研究史与中国南方大致相近，但是在这里考古学的活动更加频繁，都是由各个殖民政府所支持的。由于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以后的时期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准确地总结出这一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史，而仅能在此勾画出一幅简单的轮廓。

在最早对东南亚石器时代的遗物作出研究并写出报告的学者，在马来西亚有厄尔(G·W·Earl)(Earl, 1863; Adi Haji Taha, 1987)，在中南半岛有卡泰哈克(E·Cartailhac)(Cartailhac, 1877; Saurin, 1969)，在印度尼西亚有普莱特(C·M·Pleyte)(Pleyte, 1887; Soejono, 1969)。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零星的考古调查都是由自然科学家所主持的，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学者如艾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wallace;

1) 1981年夏，童恩正在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会见了鲍尔斯。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仍记忆清楚，精力充沛。承他的美意，向童恩正提供了1931年调查的有关资料及地图。

1869) 托马斯·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 (Huxley, 1864), 以及萨拉辛·卡曾斯 (Sarasin Cousins) (F. Sarasin, 1933; P. Sarasin, 1914; P. and F. Sarasin, 1905) 等人, 此外还有民族学家和殖民地官员等。他们所作出的报告, 内容十分贫乏, 仅仅是证明本地区存在着古老的文化, 以及提出了东南亚的出土物可能与已有较多了解的欧洲史前文化存在着某种关系的问题。

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东南亚地区才开始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值得一提的是亨利·曼修 (Henri Mansuy) 的工作。他曾经服务于印度支那的地理局。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 他即在越南北山 (Bacson) 的山区发掘洞穴遗址 (Mansuy, 1931)。以后他与科拉尼合作, 而后者曾经在和平省调查过洞穴和岩荫, 这一工作的结果是确立了和平文化, 并且将之归于中石器时代 (Colani, 1933; 1939)。伊梯埃勒·帕蒂 (Etienne Patte) 在北越海滨调查了贝丘遗址, 从另一个方面加深了对和平文化的了解 (Patte, 1925)。不久以后, 爱德蒙·索尔文 (Edmond Saurin) 在老挝进行了发掘, 证实了此地古文化的存在。

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西部, 埃文斯 (I. H. N. Evans) (Evans, 1927)、科林斯 (H. D. Collings) (Collings, 1936)。以及斯坦·卡勒菲尔斯 (P. V. van stein Callenfels) (Callenfels, 1936a) 等人也作了不少工作。卡勒菲尔斯认为和平文化遗址的分布表明了史前“美拉尼西亚文明” (Melanesoid Civilization) 从亚洲大陆到太平洋的扩展 (Callenfels, 1936b)。上述这些学者的工作, 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和平文化的资料, 而且也增强了对于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上的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的其它文化的了解。遗憾的是, 尽管很多发掘都进行得很细致, 但是当时却不具备现在新发展的技术和方法, 因此在这些报告中往往缺少重要的细节。

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东南亚的考古工作也全都停顿。但是在战后, 它又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我们在此只提一下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几位学者, 如在缅甸工作的翁塔 (Aung Thaw, 1971), 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西尔维金 (G. de G. Sieveking, 1955) 和邓恩 (Dunn, 1964)、在柬埔寨工作的塞西尔和罗兰·穆雷 (Roland Mourer, 1970), 以及在泰国工作的切斯特·戈尔曼 (Chester Gorman, 1970)。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 越南考古学家也对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的遗址作了不少研究, 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他们的成果却了解甚少¹⁾。

在本世纪的前半期, 学者们已经发现, 在岛屿东南亚部分, 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的工艺和文化与大陆东南亚是有区别的, 而且其变异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积累的大量新资料, 更加证实了这一假设。战后在岛屿东南亚部分进行过工作而应特别提及的学者有以下几位: 汤姆·哈里森 (Tom Harrisson, 1970) 在婆罗洲, 格洛弗 (Glover, 1971; 1976; 1977; 1981) 在东印度尼西亚和西里伯斯岛, 以及罗伯特·福克斯和他的同事 (Robert B.

1) 1984年, 越南的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Khao Co Hoc) 出了一期特刊 (1、2期合刊) 专门讨论和平文化问题, 所载的全是在河内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

Fox: 1970) 在菲律宾。

在最近二十年以来，东南亚的考古学研究发展很快。大量新出土的资料反映出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情况。如果再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南中国研究的进展，我们就可以发现，时至今日，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比较分析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这种比较分析不但会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有一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使我们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出新的假设。

在八十年来所积累的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为南中国和东南亚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的文化发展建立了一个序列。这一序列将在以下两个小节中予以讨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力图在此建立的是一个粗略的理论框架，所以无法讨论大量资料的细节。建立新的模式的依据，既有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也有根据新的情况而作了重新解释的旧资料。

三.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期南中国的文化序列和断代

有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划分以及其时代的确定，一直是这一地区考古学的基本课题，至今还在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些学者采用了三分法，即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只分成两个阶段，即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Ikawa-Smith: 1978）。引人注意的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并没有人建议作更进一步的划分。这样，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有关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问题：这是一个突变或是渐变？如果是渐变，它是否可以区分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独立的时期？

在南中国，经过发掘的这一时期的遗址大部分属于石灰岩地区的洞穴遗址，所以我们以下的讨论，就集中在洞穴遗址方面。一般而言，南中国洞穴中第四纪堆积的层次大致如下（莫稚：1985）：

第一层：灰褐色硬土，多被钙质胶结，厚度1—4米。内含有大量的介壳、灰烬。哺乳动物都是现生种。共出的文化遗物打制砾石石器、磨制石器、穿孔砾石、磨制的骨、角、蚌器，以及绳纹粗陶片等。此层地质上的分期属于全新世早期，绝对年代在距今7,000—10,000年左右。如著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江西省文管会：1963；江西省博物馆：1976）、桂林甑皮岩（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76）、以及柳州白莲洞上层文化（Ⅲ期）（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1987）等，均属于这一地层。

第二层：黄褐色硬土，部分被钙质胶结，厚度1—3米，内含少量介壳和成层的灰烬。哺乳动物化石主要都是现生种，但也有少量全新世所没有的绝灭种属，如华南巨猿，中国犀牛等。此层属于更新世之末，距今约10,000—20,000年。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用从砾石上打击下来的石片制成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以及凿穿的圆形扁砾石。与砾石片石器共存的尚有用坚硬石料制成的小石器。磨制的工具除骨、角器外，首先出现了刃部磨制的斧和斨。有的刃部磨制石器是用打制石器加工而成，也有的是选择自然的大小合适的扁平砾石，在其一端磨出直刃。以上这一类工具的组合既发现于洞穴里，也发现于露天遗址

中，特别是湖、海岸边的贝丘遗址中。

陶片出现于这一地层的末期。陶质粗疏，器壁很厚，火候很低。在华南或整个中国，最早的陶片是发现于柳州鲤鱼嘴岩荫遗址（柳州市博物馆：1983），其C-14时代为距今12,880±220年（BK 82090）（谢崇安、张小骅：1987）。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有：白莲洞中层文化（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1987）、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邱立诚等：1982）、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穴上层文化（李炎贤等：1986）、柳州鲤鱼嘴遗址、广东封开黄岩洞穴遗址（宋方义等：1983）、以及四川攀枝花市回龙洞穴遗址¹⁾。

第三层：黄色含沙粘土堆积，多无胶结。厚度1—3米。动物化石基本上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此层延续的时间很长，从更新世中期之末到晚更新世。我们在此仅仅讨论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一个时期，即本层最晚的一个阶段，大致相当于距今50,000年至20,000年。

我们可以用桂林宝积岩洞穴遗址的资料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王令红等：1982）。遗址所出的动物化石有大熊猫、最后鬣狗、华南巨猿、中国犀牛、东方剑齿象等。大部份工具均用砾石制成，形制简单，有石核、砍砸器和刮削器等。采用直接打击法，打击之前没有准备步骤，而以砾石的自然面作为台面。第二次加工多为单面进行。

在南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大多数石器均用从砾石上打下的石片制成，其上多保留部分原来的砾石面²⁾。如贵州黔西观音洞（裴文中：1965；李炎贤等：1978），其铀系年代为距今80,000年（原思训等：1986）；水城硝灰洞（曹泽田：1978），其铀系年代为52,000年（原思训等：1986）；兴义猫猫洞（曹泽田：1982c）；普定穿洞（曹泽田：1982a）；以及四川资阳鲤鱼桥遗址（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等，其出土的石工具均属于这一范畴。另外有少数遗址则既出砾石（石核）工具，也出石片工具，如贵州威宁草海遗址，在石工具中56.2%为石片工具，43.7%则属于石核工具（吴茂霖等：1983）；四川资阳人B地点，出土的172件石工具中55.5%是石片制成，而44.4%则属于石核工具（李宣民等：1984）。

从以上我们介绍的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在更新世的末期，即大致20,000—10,000年以前，在华南的物质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这些因素既不同于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不同于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应该视为一种转变阶段的文化。它们包括：砾石工具、用燧石、石英等坚硬材料制成的细小石片工具，石器的刃部磨制技术，以及扁圆形穿孔砾石。如果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新因素与南中国及大陆东南亚的旧石器时代传统有别，可以作为中石器时代文化而单独划分出来。当然，有关这一阶段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社会发展的情况，尚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1) 据童恩正实地观察结果。资料尚未发表。

2) 有的中国学者习称此类石器为“砾石工具”。这一点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在西方学者中，“砾石工具”仅指用砾石制成的石核工具。

四.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期东南亚的文化序列和断代

由于在研究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学者中，包括了很多国家和不同的学派的人，所以在概括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并建立一全面的文化发展序列时，其困难要比华南大一些。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这里现有的发掘报告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以建立全地区性的地层发展序列。不过考虑到东南亚地区自然环境极大的变异性，除了最笼统的概括以外，恐怕也不可能出现任何地层方面的一致的规律性。尽管如此，即使在资料相对缺乏，在学者们使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各不相同，惯用的名词术语和报导的重点也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描绘出一幅粗略的图画。就现有资料来看，在更新世以后的文化发展中，大陆东南亚与岛屿东南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过另一方面，在南中国与大陆东南亚之间，其文化发展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所以我们在以下的讨论中，主要集中于大陆东南亚；对于岛屿东南亚的问题，只有在相关时才作简要的介绍。

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期大陆东南亚的文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晚期 这一时期也可称为“晚转变期”，迄今为止，对于其特征的了解仍然很少。不过至少在北越，它是以素面陶及绳纹陶、单面加工的砾石工具、石片石器、磨石、骨工具、穿孔扁平砾石 (Sorenson: 1975) 以及刃部磨制技术为特征的。采用刃部磨制技术的工具可以是打制的石器，也可以是一块大小形状适合的砾石。在越南的北山地区 (Bacson Area)，刃部磨制技术非常普遍，以致有的学者将包含刃部磨制工具在内的器物群称为“北山式工具” (Bacsonian)。

从遗址的地理分布和时间上来看，这一期文化与中期文化的区划尚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以刃部磨制或甚至部分器身磨制作为主要特征来考察，那么本期的遗址可以用一系列越南——特别是北山山区一的洞穴遗址和岩荫遗址、位于沱巴 (Da But) 的贝丘遗址 (Patte, 1932) 和另外几处类似的遗址、以及某些过去分类为“和平文化”遗址的上层文化 (Boris-kovskii: 1966—1968) 作为代表。打制的以及刃部磨光的砾石工具也还见于缅甸的巴打林洞穴遗址 (Padah—lin Cave) (Aung Thaw: 1971)、马来西亚的几处洞穴遗址 (Matthews: 1961)、菲律宾巴拉望岛的马拉梅洞穴遗址 (Mara'may Cave) (Fox: 1970) 以及沙捞越 (Sarawak) 的尼阿洞穴遗址 (Niah Cave) (Harrisson: 1959; Majid: 1982)。应当指出的是，在各处遗址中，刃部磨制工具的断代是很不一致的，为此越南考古学家一直在争论所谓“北山式工具”究竟是属于和平文化的后一个阶段，或者仅仅是和平文化的地区性变异¹⁾。所以仅就刃部磨制技术这一单一因素而言，也许难以成为划分转变阶段与新石器阶段的标准。陶器出现的情况，可能也与之类似。不过另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和平文化延续很长的遗址，其上层经常出现刃部磨制工具和陶片；如果这两个因素已经在较早

1) 有关这一争论的详情，请参考 Ha van Tan: 1978; 1980; Saurin and Carbonnel: 1974; Bui vinh: 1984; Ha Huu Nga and Nguyen Trung Chien: 1984; Nguyen Van Hao: 1984; Nguyen Viet: 1984.

的时期出现,则其数量必然增加。

在北越,北山文化洞穴遗址的时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7,900年之间(Bronson, 1983; Ha Van Tan, 1980)。沱巴贝丘遗址有一个C-14数据,为距今 $6,095 \pm 60$ 年。另外一个 大贝丘遗址昆万(Quyn Van)同样出土有陶片、打击石器、两面加工的石核石器,但是却没有发现刃部磨光工具。其C-14时代有两个数据,较沱巴晚2,000年。有的学者对此年代提出质疑,认为昆万遗址应为北山文化的沿海类型。在越南以外,所有发现刃部磨制技术的遗址都没有C-14数据。

中期 这一时期的遗址在东南亚的分布极为广泛。在大陆东南亚,它属于典型和平文化阶段。其文化特征是两面或单面加工的砾石石器、小石片(包括少量石叶)、磨石,在晚期,则出现了绳纹陶片。动物骨骼均为现生种。由于遗址的位置不同,其中也可能包括淡水软体动物、海生软体动物、以及各种脊椎动物,反映出对于自然资源的极为广泛的利用。

在北越,很多洞穴遗址的文化均属于此类,其时代约在距今12,000至7,500年之间(Ha Van Tan, 1978; 1980)。在越南以外的其它地区,也有很多遗址显示出相似的文化,但其年代差距很大,从距今12,000年至1,000年不等(参考表一)。其中最重要的有: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Spirit Cave)以及其它的洞穴遗址(Gorman, 1970; Heekeren and Knuth, 1967; Pookajorn, 1981),泰国南部的朗隆日遗址(Lang Rongrien)(Anderson, 1978),柬埔寨的拉昂斯皮恩遗址(Laang Spean)(Mourer, 1977),马来西亚的古克奇尔洞穴遗址(Gua Kechil)和古察洞穴遗址(Gua Cha)(Adi, 1985; Dunn, 1964; Sieveking, 1955),苏门答腊的海岸贝丘遗址和其它露天遗址(Heekeren, 1972; Brandt, 1976),沙捞越的尼阿洞穴遗址(Harrisson, 1959; Majid, 1982),以及巴拉望和吕宋东北部的一些洞穴遗址(Kress, 1977; Peterson, 1974; Thiel, 1981)。

在东南亚苏门答腊及菲律宾以东的岛屿上,迄今尚没有发现过全新世早期的以砾石工具为主体的文化,不过与和平文化相似的砾石工具的零星发现却遍于整个岛屿东南亚。由于这些工具出土时多缺乏地层依据,所以过去的研究者经常将之归入旧石器时代早期(Hutterer, 1985; Heekeren, 1972)。概括而言,岛屿东南亚更新世早期的石器工艺是以石片和石叶为基础的;不过它们与大陆东南亚的文化关系现在尚不清楚。

就出土器物的组合而言,东南亚存在着很多区域性的或甚至地区性的变异。这种变异包括某种工具类型的有无或出现多少的相对频率,砾石(石核)石器与石片石器的比例,动物骨骼的不同等等。这一事实过去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激烈的、然而却毫无结果的争论,争论的内容往往是某一群器物是否可以归之于和平文化。在那种时候,人们还不了解这种变异是否反映了相同的人群集团对周围特殊环境的适应,或者是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也不了解在全部出土物中石片石器成分多少的不同,究竟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在那种时候,人们还认为和平文化只分布于两种地形之中,即内陆丘陵和山地的洞穴以及沿海的贝丘(Gorman, 1971),而现在我们却已经知道和平文化类型的砾石工具亦散见

于露天遗址之中，其分布非常广泛，北至泰国的东北部（Sood Sangvichien, pers. comm.），南至菲律宾（K·L·H·, personal observation）和苏门答腊均有发现（Brandt, 1976）。

近年来费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和平文化的越南考古学家，已经识别了典型和平文化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他们称之为山维文化（Son Vi Culture）。这种文化在很多山地的露天遗址以及洞穴遗址中均有发现，从地层上看叠压在典型和平文化之下。其特征是粗糙的砾石石器（但是没有特征性的和平文化工具，如“杏形砍器”及短斧等）、砾石碎片制的工具、以及未作第二次加工的石片等。从时代上看，较早的为距今18,000年，如翁屈云洞（Ong Quyen）；较迟的为距今11,000年，如昆穆恩洞（Con Moong）（Ha Van Tan: 1980; Pham Hui Thong: 1980）。

除了越南以外，这一文化阶段在东南亚其它的地区并无发现。考虑到在马来半岛及岛屿东南亚均有一些经过发掘的遗址，其时代从距今30,000年以前一直延续到全新世，但是未见这一文化阶段的痕迹，所以我们推测它可能并不存在于这些地区；如果有这一阶段的存在，起码也不是采取的统一形式。除此以外，这种由山维文化发展到和平文化的序列也未见于除越南以外的任何大陆东南亚的报告。为此我们认为，所谓山维文化阶段究竟是仅仅局限于北越，或者它同样存在于东南亚其它的地方和南中国，是一个值得更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早期 实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整个岛屿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是以石片工艺技术以及少量的砾石工具及两面加工的石核工具为特征的。典型遗址见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塔邦洞（Fox: 1970）、马来西亚沙捞越岛的尼阿洞（Harrisson: 1959; Majid: 1982）、以及加里曼丹岛的丁卡约（Tingkayu）露天遗址（Bellwood: 1984）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良布伦第二地点（Leang Burung 2）（Glover: 1981）。

在大陆东南亚，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且有可靠的报告和准确断代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就是泰国南部的朗隆日遗址（Anderson: 1987）。该遗址可分为两层，在这两层之间，有一长时期的间隔。下层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27,000—30,000年。上层为全新世早期，时代约为距今9,600—7,500年。下层出土的石器均为制作良好的一面或两面加工的石片工具，外加极少数砾石工具。一些石片工具还保留有部分原来的砾石面。上层则为典型的和平文化，包括石片工具和百分之十五的用页岩打制的砾石工具，发掘者安德逊（Anderson）曾经指出上下两层之间明显的技术差异，并对所谓和平文化在全新世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传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朗隆日遗址的和平文化层代表了人类一种新的适应方式，反映出从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到较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

五. 关于中石器时代转变时期的讨论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大致而言，南中国和东南亚晚更新世一早全新世的文化序列是很相似的，尽管在每一序列的内部，尚存在着一些地区性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与

其说是序列之中实际的变化,不如更多地看成是考古学方法论中个别不同传统的器物的变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试图将这一区域内所有的资料都纳入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本文的附表显示了南中国和东南亚有关的遗址,它们是按C—14年代的前后排列的。

对于上文的讨论,我们将总结出以下几点:

1. 在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时,在南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文化序列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2. 文化联系最紧密的地区,是中国的广西、贵州、广东、云南、江西、四川和东南亚大陆的北部。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此种相似性仍然可以被观察到。在婆罗洲和菲律宾,情况就已经很复杂。在更加东部的岛屿上,其文化与大陆上转变时期文化的相似性就消失了。

3. 尽管在大的系统上有其相似性,但是就工具制造技术和器物组成的类别而言,各区域各地区、各亚区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的。

4. 东南亚的文化序列从断代上看并非是整齐划一的。这也就是说,在时代表上排列的每一文化因素,都可能延续到以后的阶段。

5. 从总体上看,南中国和东南亚的这一文化序列在考古学上呈现出一套有关联的复合体,明显地反映出一种转变的特征,它既不同于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与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别,故而有理由将之定为“中石器时代文化”。

对于上述的第四点和第五点,我们尚须作进一步的说明。从附表断代的情况来看,各阶段时代参差不齐的情况在东南亚非常明显,然而在南中国则不存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在文化发展的速度上确实存在差异。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由此就会派生出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南中国,同样存在着时代参差不齐的情况,但是由于C—14断代资料太少,所以没有反映出来。而在东南亚,有关这一时期的C—14数据很多,要想提出怀疑是很难的。

至于同一文化出现很大的时代差异的原因,我们在此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另一项争论密切相连的,这就是我们究竟将和平文化看成什么性质?是一种文化?一种技术传统?或者是技术复合体?换句话说,和平文化出土器物的特征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的?是决定于文化传统?是决定于对于独特的环境的适应?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在研究任何一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时,我们都不能采用只具有简单因果关系的概念模式,即使在中石器时代,分散的狩猎—采集群所遭受的自然环境的压力要比以后的农业社会或城市社会强大得多,直接得多,情况仍然是如此。在东南亚,某些文化因素长期延续到后代的情况,不但仅仅出现于中石器时代,而且出现于整个史前时代¹⁾。其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与这一区域中人群集团的迅速分化有关,这一分化可视为一种“生态的”进程,亦即一种文化的力量与自然环境的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

1)正是由于这种断代上的不整合性,所以很多东南亚考古学家都不再采用欧洲考古学的某些名词,因为这些名词往往是与清楚的时间界限相连的。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一地区中石器时代转变时期的性质。为什么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技术会被以砾石工具为主的技术所代替？而砾石工具以后又逐渐为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所代替？在欧洲，当“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时，当时已有大量的资料足以证明在更新世之末与全新世之初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广泛的变迁，迫使人们采用新的适应方式。在南中国和东南亚，这种激烈的自然变迁是否也存在呢？

由于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能详细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在已经在加紧进行，很多结果均已表明，这一地区的环境变迁可能比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whyte, 1984; Anderson, 1987）。在当代，南中国和大陆东南亚（特别是其北部），均有着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从更新世全球性的气候波动的性质来看，如果在更新世至全新世转变之际有任何变动，那么这两个地区所经历的也应该相同，至少就总的趋势来说是如此。

六. 对某些“新石器时代”技术因素的再认识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ordon Childe）曾经使用“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词，以概括全新世早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迁。从物质上看，他以一些新的文化因素来区别新石器时代，其主要成分是农业、家畜、陶器、磨制石器以及纺织品等（Childe: 1936: 59）。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考虑到新石器时代产生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激烈变动，使用“革命”这一概念仍然是可以的；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各地考古学的新资料均已经表明，这些变化并不是如同柴尔德所想象的那样突发的、事变性的，这些文化因素也并非产生于某一个中心，然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

时至今日，考古发现和理论分析均足以证明人类向食品生产经济的过渡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独立发生的，这是一种人类文化与当地的具体环境不断地交互作用的缓慢过程；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环境，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文化形式也是多样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石器时代这一影响深远的变迁，我们必须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就这一意义而言，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除了足以阐明本地区人类的历史以外，也具有全球的重要性。

在南中国更新世末期堆积中所发现的磨制的骨角器，是一饶有趣味的问题。1981年，在贵州普定的穿洞遗址，发现了400多件磨制的骨角器，其种类有锥、叉、“铲”等，均是初步打制成型然后再加以磨制（曹泽田：1982 a）。1975年，在贵州兴义猫猫洞也发现过14件磨制骨器，包括锥和刀（曹泽田：1982b）。在以上讨论的南中国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磨制的骨角工具非常普遍；而在东南亚的某些和平文化的遗址中，亦有类似的发现。此现象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考察：首先它说明了磨制技术的起源过程；其次，它也表现了人类获取食物和准备食物的技术的进化。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至少在南中国，制造工具中使用的磨制技术并非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而是肇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加工的物质乃是有机的原料，如骨、

角、竹、木等，它们都相对的松软，而且来源丰富。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有机物质制造的工具在磨制以后尚需加热，使其表面炭化，以增加硬度。在穿洞和猫猫洞发现的骨角工具很多均有烧过的痕迹，当出于这种目的。如果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制造石器时也使用过加热的技术，那么这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中石器时代，碾磨技术开始使用于石器制造。由于石质坚硬，碾磨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最初人们只磨制其刃部。刃部磨制的工具最早出现于白莲洞二期文化，以后才迅速传播至其它地方。

在南中国，陶片最早发现于鲤鱼嘴遗址，其年代约为距今 $12,880 \pm 220$ 年，如果断代无误，这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发现的最早的陶片。略迟一点的是白莲洞三期文化所发现的陶片，其年代约为距今 $11,670 \pm 150$ 年。在东南亚，最早的陶片发现于泰国北部的仙人洞，C—14年代为 $8,142 \pm 390$ 年。文化的对比研究已足以证明，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与某种主食的烹调紧密相连的，这种主食经常意味着小颗粒的食物的采用，特别是稻米之类的谷物。要弄熟这类食物，耐火的器皿几乎是难以缺少的，尤其是采用煮或蒸的方法¹⁾。这样，在中石器时代本地区出现陶器一事，也许就暗示着此时稻米已成为居民的重要食物。有一点应注意的是：在南中国和东南亚北部，野生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从遗传学的、生态学的和考古学的观点来看，这一区域都可能是最早栽培稻米的地方。

对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论是碾磨技术或是陶器制造就其本身而言均不一定要与农业相联系，或者一定是新石器时代的指示²⁾。至少在南中国或东南亚，它们仍是中石器时代文化技术的一个组成部份。在发现最早陶片的鲤鱼嘴遗址或白莲洞遗址，就并没有任何农业、家畜驯养或纺织的痕迹。

戈尔曼曾经认为，仙人洞发现的植物遗存有可能会暗示出早期农业的存在(Gorman, 1970)。但进一步的植物学的研究却不能支持这种论点(Yen, 1977)。在戈尔曼的论点的启发下，越南考古学家也曾经宣传在和平文化阶段已有初期的植物栽培，如对北越宋桑洞穴遗址(Sung Sam Cave)出土植物的孢粉分析就曾经引起很多讨论，但其结果亦与仙人洞的讨论相似(Ha Van Tan, 1980)。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南中国和东南亚，磨制及陶器等技术因素并不一定与农业有关，因而不能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因素来看待。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与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人类谋生技术的转变相联系，从而构成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

七. 小石片工具工艺的问题

在更新世末期，由坚石原料制作的细小石片工具，开始出现于南中国的某些洞穴中。它

1)当然，这里也可以采取其它的代用技术，如在东南亚某些地区，人们用竹筒煮饭，或者将米粒磨成粉，再烘烤成饼。

不过这些方法均有其局限性，并不是很方便的。

2)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曾发现过通体磨光的石斧，其时代约在距今20,000年，而这种文化是绝对没有农业的。